主动性人格对抑郁的影响：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的链式中介作用

黄莹乐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目的：研究主动性人格和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为心理干预提供参考。方法：修订了中文版的主动性人格量表（proactive personality scale,简称 PPS）,对 300 名大学生初测中文版 PPS,项目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证明了 PPS 量表的信效度。采用抑郁量表，社会支持量表以及修订后的主动性人格量表通过网络随机征集 301 名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1）大学生主动性人格、抑郁症状和社会支持两两显著相关；（2）Process 模型结果显示，主动性人格与抑郁呈显著的负向相关，主动性人格通过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影响抑郁水平。结论：主动性人格对抑郁有负向影响。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在主动性人格对抑郁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关键词：抑郁；主动性人格；社会支持；大学生

DOI：doi.org/10.70693/202607209037

The influence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on depress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Huang Yingle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upport on depre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thods: The present study revised the Chinese proactive personality scale PPS (proactive personality scale) .A sample of 301 graduates complete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scale (PPS) . Item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prove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PPS. Depression scale,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revised proactive personality scale were used to measure 301 college students. Results: (1) proactive personality,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ocial support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2) The results of the Process model showed that active personality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and active personality affected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through objective support and support utilization. Conclusion: Proactive Personal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depression. Objective support and support utilization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on depression.

Keywords: Depression；proactive personality；social support；college students

作者简介：黄莹乐(1999—)，女，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教育心理与学校心理学。

通讯作者：黄莹乐

1.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既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深入开展健康中国行动后，2023 年，教育部等 17 个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与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大学时期是青春期到成年期的重要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伴随着社会角色、学习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生面临着更高的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障碍的风险病(Karyotaki et al.,2020)。抑郁是一种以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活动减少为主要特征的广泛存在的情绪障碍（Smith,2014），可分为抑郁情绪(depressed mood)（Peterson et al., 1992）、抑郁症状(depressive symptoms)（Achenbach ,1991）和基于临床诊断的抑郁性神经症(depressive neurosis)（美国精神病学会,1981）三种呈阶梯状发展的形态（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3）。国内一项针对 33565 名大学生的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 24. 7% (王蜜源等,2020)。抑郁会对个体的健康和适应发展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不仅会导致物质滥用、睡眠障碍和饮食问题，还会带来极大的心理痛苦，严重降低生活质量，并可能引发自伤和自杀等极端行为为（Hirschfeld et al.,2000;Yang et al.,2023）。因此，探讨大学生抑郁影响机制显得尤为必要。

基于 Bandura 的社会认知理论 (Social Cognitive Theory)，个体、行为和环境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情境会影响大学生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反之，大学生个体也可以有意识地改变自己所处的情境。也就是说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于从高中阶段升入大学阶段的本科生更是如此，因为从高中到高校，是一个需要由“被动”变“主动”的关键转折期。主动性人格是指个体不受环境阻力的约束，能够主动地采取行动改变周围环境的一种稳定的人格倾向（Bateman & Crant,1993）。具有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更易采取一些自发或主动行为来改变周围的环境（Hu et al.,2020）。研究表明，大学生主动性人格对亲社会行为、组织公民行为等积极利他行为具有积极的预测作用（严鸣等,2024;张璐 等,2024;Choi & Hwang,2019）。但鲜有以往研究探讨主动性人格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已有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对个体的求助行为有显著影响。主动性人格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积极主动地求助于他人，以此解决工作或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高斌 等,2020)。因此，主动性人格水平较高的个体在面对个人心理问题时更可能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去解决问题。根据情绪调节过程模型理论，当个体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面对使人产生消极情绪体验的事件，或者对情绪事件进行合理化时，就能降低自身消极情绪体验 (Gratz, Weiss, & Tull, 2015) 。

综上，主动性人格水平高的个体，在面对困难和消极情绪体验时，更倾向于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改变情况，从而降低自身绝望感、无助感等消极情绪体验，体验到幸福感等积极情绪（张岚, 2023）进而降低抑郁情绪的水平。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主动性人格与抑郁水平存在显著负相关。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体的行为除了受个体因素的影响外，还会受外部因素及其两者交互作用的影响 (Bandura，1986) 。社会支持作为影响个体行为和发展的关键环境因素(朱守信等,2024)，是指个体从社会关系网络(如家人、朋友、学校、社区等) 中所获得的物质帮助或精神支持(谢莉 等,2024)，也是影响个体内部特质作用大小的重要调节变量 (郑爽 等，2022) 。研究表明，主动性倾向较高的个体，更愿意参与社交互动，并通过建立大量的人际联系来获取信息和资源，进而可以从中获得良好的社会支持（皮陆杨等,2020）。另外，依据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社会支持具有普遍增益作用，可以减少个体的不良情绪（如抑郁），在维持个体身心健康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王旭 等,2022;陈子逸 等,2024）。因此，社会支持可能是联结主动性人格与抑郁水平的重要桥梁。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主动性人格通过社会支持影响抑郁水平。

以往针对主动性人格的研究较多聚焦于组织行为学领域，较少关注其在心理领域的应用。目前，国内鲜有研究将主动性人格这一积极的人格特质与社会支持这一人际变量相结合，共同考察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综合考察个体因素（主动性人格）和环境因素（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抑郁水平的作用机制，以此进一步拓展主动性人格的应用范畴，并为专业心理求助的干预实践提供实证依据。

2.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样本主要取自中南民族大学预科生、本科生及研究生，其中含其他高校本科生。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发放线上调查问卷施测，共收回问卷 346 份，进一步筛查，排除不合格样本后共收回有效问卷 301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87%。所有被试的年龄处在 17～25 岁之间，平均年龄 19.82 岁（SD=1.32）。其中，男生 133 人，女生 168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自编主动性人格问卷

主要通过参考 Bateman 和 Crant 等（1993）的量表，在此基础上修订而成，采用利克特 7 点评分，其中 1 代表“非常不同意”，7 代表“非常同意”；一共 34 道题目。问卷内容包括：主动改变个人现状、主动帮助他人、主动性与创造性等项目。个体的得分越高，表示其主动性人格水平越高。编制完成后对 300 名大学生进行初测,项目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证明了该量表的信效度（分半信度为 0.894,克隆巴赫α系数为 0.912；KMO 检验值为 0.955，Bartlett 球形检验值达到极其显著水平）。

2.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选用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由肖水源于 1986 年编制，该量表共有 10 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3 条）、主观支持（4 条）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 条）三个维度。得分越高，代表其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对于某些条目进行简单修改，使其更加适用于大学生群体。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 0.816。

2.2.3 抑郁量表

选用 Zung 编制的抑郁量表（1965），含有 20 个项目，每个项目由七级评分构成；包括精神性-情感症状两个项目，躯体性障碍八个项目，精神运动性障碍两个项目，抑郁性心理障碍八个项目。得分越高，代表其抑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 0.88。

2.3 研究程序

利用问卷星平台进行施测，各高校本预科生、研究生进行填写。所有被试回答之前，屏幕上出现提示语，告知被试自愿遵守保密原则，完成整个问卷需要 8 分钟左右，随后对数据进行了整理，运用 SPSS27.0 和 Hayes(2018) 开发的 PROCESS3.0 插件进行数据分析。

对自编主动性人格问卷、社会支持自评量表、抑郁量表 3 个量表，根据各量表使用手册，对各量表的每个维度分数和各维度总和的全量表分数分别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采用了探索性因素分析、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共同偏差检验等分析方法。

3.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全部采用问卷收集,结果可能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因此,在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过程中采用了部分题目反向计分、强调数据的匿名性和保密性等措施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程序控制(周浩 等,2004)。在数据收集完成后,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因子分析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统计检验(熊红星 等,2012)。结果表明,未旋转时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21 个,解释了 66.31%的变异,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18.66%的变异,小于前人推荐的 40%的判断标准,故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表 1 列出了主动性人格，抑郁，社会支持及其三维度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以及这几个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主动性人格与社会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显著正相关($p < 0.01$)，与抑郁显著负相关($p < 0.01$)。抑郁与社会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显著显著负相关($p < 0.01$)。主观支持仅与社会支持总分显著相关，因此在后续分析中不考虑此变量。

表 1 主动性人格、社会支持、抑郁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1 主动性人格	70.32	13.07						
2 社会支持总分	32.51	5.21	0.22**					
3 抑郁	51.42	8.04	-0.34**	-0.32**				
4 客观支持分	8.11	2.76	0.15**	0.68**	-0.28**			
5 主观支持分	16.88	2.94	0.043	0.67**	-0.05	0.07		
6 支持利用度	7.51	2.02	0.289**	0.65**	-0.36**	0.31**	0.17**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主动性人格与抑郁间的关系：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主动性人格作为自变量,抑郁作为因变量,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为中介变量，根据 Process 程序中的模型 6 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该方法可以对链式中介模型进行整合性检验,见表 2。

表 2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客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抑郁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常量	5.88	0.86	6.81***	3.19	0.63	5.05***	73.19	2.53	28.97***
主动性人格	0.03	0.01	2.63***	0.04	0.01	4.61***	-0.15	0.03	-4.65***
客观支持				0.20	0.04	5.10***	-0.51	0.16	-3.22***
支持利用度							-0.91	0.22	-4.11***
R^2	0.02			0.16			0.22		
F	6.91***			27.78***			27.44***		

由表 2 可知,主动性人格显著预测客观支持,主动性人格和客观支持显著预测支持利用度,主动性人格、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显著预测抑郁。加入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后,主动性人格对抑郁的影响仍然显著，因此客观支持在主动性人格和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同理,支持利用度在主动性人格和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主动性人格、支持利用度在主动性人格和抑郁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模型图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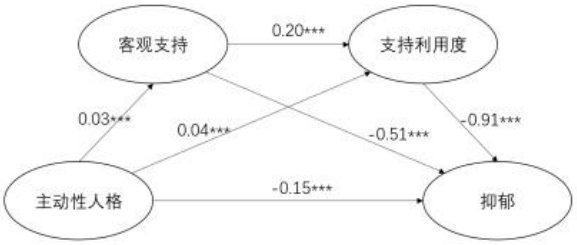

图 1 主动性人格和抑郁的关系: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的链式中介作用

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分别计算 95%的置信区间，结果如表 3 所示。结果显示，检验的各条路径所对应的置信区间均未包含 0，说明中介效应均显著，链式中介成立。三条中介路径的效果量分别为 7.6% (路径 1)、16.6% (路径 2) 和 2.8% (路径 3)，总中介效果量为 27.5%。

表 3 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在主动性人格和抑郁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效应量(%)
直接效益	-0.153	-0.033	-0.219	-0.089	
路径 1	-0.016	0.009	-0.037	-0.001	7.6%
路径 2	-0.035	0.012	-0.062	-0.015	16.6%
路径 3	-0.006	0.003	-0.014	-0.001	2.8%
总中介效应	-0.057	0.016	-0.091	-0.029	27.5%

注：路径 1：主动性人格-客观支持-抑郁；路径 2：主动性人格-支持利用度-抑郁；路径 3：主动性人格-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抑郁。

4.讨论

4.1 主动性人格对抑郁的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主动性人格对大学生的抑郁水平有负向预测作用。即主动性人格水平高的个体其抑郁水平较低，反之主动性人格水平低的个体其抑郁水平较高。研究假设 H1 得到验证。这一结果与李雪霓等人（2008）的研究一致。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社会认知理论中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效能感观点。社会认知理论强调个体能够通过自我调节过程来设定目标、计划行动，并监控自身行为以达成目标。具体来说，主动性人格特质高的个体，往往具有更强的自我效能感(靳义君,2024)，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有效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Parker & Collins, 2010）。这种积极的自我信念促使他们更主动地去改变不利的环境(Griffin, Parker, & Mason, 2010)，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从而减少了抑郁情绪的产生。例如，面对学业压力或人际关系困扰时，主动性人格高的个体不会被动地忍受，而是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王伟等,2017)，如主动与同学沟通、学习新的技能来提升能力，这种积极的行动有助于他们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降低抑郁的风险(马素红,2017)。

相反，主动性人格低的个体在面对困难时，可能更倾向于被动等待外界的帮助，缺乏改变现状的动力和行动，久而久之，他们会觉得自己对生活失去控制，进而产生无助感和抑郁情绪。这

一结果提示我们，在心理健康干预中，可以通过培养个体的主动性人格特质，提高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调节能力，来预防和缓解抑郁症状。

4.2 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在主动性人格与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果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三者关系的理解。链式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社会支持通过三条路径影响抑郁水平：①通过主动性人格—客观支持—抑郁的中介路径；②通过主动性人格—支持利用度—抑郁的中介路径；③通过主动性人格—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抑郁的中介路径。研究假设 H2 得到验证。人格特质通过社会支持这一重要的环境因素对抑郁发生作用，社会支持在人格的良性作用中起增益作用。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杨通华 等,2016）。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社会认知理论中关于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该理论认为人与环境的作用是相互的，行为同时受到内在因素（个体主动性人格）和外在因素（社会支持）的影响（刘春莉 等,2020）。个体的主动意识（内在因素）可以激发起社会支持（外在因素），社会支持反过来又通过关心个体，不断地激励个体，增强个体的自信和自尊，促进个体幸福感的提升，从而使个体的抑郁水平降低。具体来说主动性人格高的个体不仅自身更善于采取积极行动来应对生活，而且他们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行为也更容易吸引他人的关注和支持。

三条路径中，主动性人格—支持利用度—抑郁的中介路径呈现出最大的效应量。这表明，个体的主动性人格特质在对抑郁的影响中，转化对支持的有效利用起关键作用。已有实证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倾向强的个体会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Wang & Lei ,2023;皮陆杨 等,2020）。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来看，主动性人格强的个体更善于主动感知并挖掘身边潜在的支持资源，并能高效地将其转化为应对压力和负面情绪的助力。例如，在社交场合中，主动性人格高的个体更愿意主动与人交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当他们遇到困难时，这些人际关系网络就会转化为实际的社会支持资源，如情感支持、物质帮助等(Yang et al.,2011)。社会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资源，能够为个体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和实际的帮助，增强个体应对压力的能力，从而减轻抑郁症状(张春艳等,2023)。这种直接且高效的利用支持的方式，使得这一路径在减轻抑郁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也进一步凸显了个体主观能动性在心理健康维护中的核心地位，提示我们在干预实践中，着重培养个体对支持资源的敏锐感知与有效利用能力，可能会对预防和缓解抑郁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主动性人格—客观支持—抑郁中介路径的效应量次之。这意味着客观存在的支持资源在主动性人格与抑郁之间也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具体而言，当个体面临压力事件时，来自家人、朋友或同事的情感支持可以让他们感受到被关心和理解，提升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压力；而物质支持则可以直接解决个体面临的实际困难，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陈雪峰,时勘,2008)。主动性人格较高的个体往往能够通过自身的积极行为，如主动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参与社交活动等，吸引更多来自外界的实际帮助和支持，这些客观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个体所面临的压力源，进而降低抑郁发生的可能性。然而，相较于支持利用度，客观支持的效应量相对较小，这可能是因为仅仅拥有客观支持并不足以完全抵御抑郁的侵袭，关键还在于个体是否能够积极主动地去识别并接纳这些支持，否则，即使周围存在丰富的支持资源，也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对抑郁的缓冲作用，这也再次印证了个体主动性在心理健康过程中的关键调节角色。

而主动性人格—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抑郁中介路径的效应量最小。这一路径相对复杂，涉及多个环节的传导过程，可能在信息传递和资源转化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损耗或稀释，从而导致其对抑郁的最终影响相对较弱。尽管如此，这一路径的存在仍具有重要意义，它揭示了主动性人格通过影响客观支持的获取，进而作用于支持利用度，最终对抑郁产生影响的完整逻辑链条。这提示我们在研究和实践中不能忽视各个因素之间的间接作用机制，虽然其效应量较小，但在综合理解整个心理社会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完善理论模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综上，社会支持在主动性人格与抑郁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主动性人格通过影响社会支持的获取，进而影响个体的抑郁水平。这一中介作用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方面，我们在培养个体主动性人格的同时，要注重引导他们利用自身的主动性去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主动性人格相对较低的个体，我们可以通过直接提供社会支持的方式，如组织学院支持活动、提供

心理咨询服务等，来帮助他们缓解抑郁情绪，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4.3 研究意义和未来展望

本研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危机干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首先，高校应坚持以学生为主体，重视其主动性人格的培养和形成。可设计专门的培训项目来提升个体的主动性人格特质。同时，通过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等方式，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应对能力。

其次，家校社合作，营造一个积极支持的社会环境。通过多方联动促进成员之间的交流互动，帮助个体建立和拓展社会支持网络。高校可引导学生主动向师长、同伴及家人倾诉心理困扰，主动获取社会支持，维护自身心理健康。

最后，社会应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提高公众对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消除对心理疾病的歧视，使个体在面临心理困扰时能够更愿意主动寻求帮助。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社会认知理论，并发现其具有较好的跨领域一致性。同时，本研究揭示了主动性人格可以通过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大学生抑郁水平产生影响，这进一步拓展了主动性人格的应用领域。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无法明确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采用纵向追踪研究，通过多时间点变量观测，深入探究变量间的因果逻辑与动态演变规律。第二，本研究仅选取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应对方式、认知风格等潜在中介或调节变量未纳入研究，后续可拓展变量维度，深挖主动性人格与大学生抑郁水平之间的深层作用机制。第三，本研究样本仅为中南地区 301 名大学生，样本覆盖范围与体量有限，研究结果普适性受限。后续研究可扩大样本规模，覆盖不同年龄、性别、文化背景及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进一步完善研究结论，为大学生心理干预策略优化提供更可靠依据。

参考文献：

[1]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Prentice Hall.

[2]Bateman, T. S., & Crant, J. M. (1993). The proactive component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 measure and correlate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4(2), 103 - 118.

[3]Choi, L., & Hwang, J. (2019). The role of prosocial and proactive personality in customer citizenship behaviors.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36(2), 288 - 305.

[4]Griffin, M. A., Parker, S. K., & Mason, C. M. (2010). Leader vi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daptive and proactive performance: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5(1), 174 - 182.

[5]Hirschfeld, R. M., Montgomery, S. A., Keller, M. B., Kasper, S., Schatzberg, A. F., Hans - Jurgen, M., & Versiani, M. (2000). Social functioning in depression: A review.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61(4), 268 - 275.

[6]Hu, S. G., Liu, H. F., Zhang, S. Q., & Wang, G. Y. (2020).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cross - cultural adjustment: Roles of social media usage and cultural intellig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74, 42 - 57.

[7]Karyotaki, E., Cuijpers, P., Albor, Y., Alonso, J., Auerbach, R. P., Bantjes, J., Kessler, R. C. (2020). Sources of stres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mental disorde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Result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s International College Student Initiativ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1759.

[8]Yang, W., Tang, L., Shen, X., Niu, G., Shi, X., Jin, S., & Yuan, Z. (2023). Parental phubbing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COVID - 19: A serial meditating model.Behavioral Sciences, 13(5), 371.

[9]陈子逸，张天成，张福兰，周县委，刘阳，马渊源，郭淑媛. (2024). 初中生孤独感与社会支持的发展轨迹及相互作用. 中国学校卫生, (11), 1604 - 1608.

[10]陈春宇，连帅磊，杨晨，等. (2019). 手机成瘾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疲惫感和反刍思维的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7(4), 746 - 749.

[11]何灿，魏华，严春霞，王琛. (2021). 网络被欺负对青少年自伤的影响：抑郁和体验回避的序列中介效应.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9(2), 338 - 342.

[12]高斌，高显文，吴晶玲，王娟. (2020). 大学生主动性人格与专业心理求助意向的关系：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心理研究, (6), 566 - 573.

[13]靳义君. (2024). 未来时间洞察力对青少年学业投入影响的纵向研究.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5), 95 - 103.

[14]李彩娜, 董竹, 王瑶瑶, 等. (2015). 大学生抑郁与自我中心: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的中介. 中国特殊教育, (10), 55 - 62.

[15]皮陆杨, 莫欣欣, 王保卫, 陈之望, 李源璿, 何旖清. (2020). 大学生主动性人格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 领悟社会支持与基本心理需要的中介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8(3), 114 - 118.

[16]沈友田, 胡笑羽, 叶宝娟. (2018). 压力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 领悟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探新, 38(3), 76 - 81.

[17]孙庆民, 刘一帆. (2019). 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7(1), 185 - 188.

[18]王蜜源, 韩芳芳, 刘佳, 等. (2020). 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及相关因素的 meta 分析.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34(12), 1041 - 1047.

[19]王明忠, 范翠英, 周宗奎, 等. (2014). 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抑郁和社交焦虑: 基于认知 - 情境理论和情绪安全感理论. 心理学报, 46(1), 90 - 100.

[20]王旭, 刘衍玲, 林杰, 等. (2022). 亲子关系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社会支持和心理素质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8(2), 263 - 271.

[21]肖水源. (199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4(2), 98 - 100.

[22]谢莉, 金辉, 王志英, 胡宇飞, 杨喜兰, 席娟. (2024). 脱贫内生动力对贫困大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 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 386 - 397.

[23]熊红星, 张璟, 叶宝娟, 郑雪, 孙配贞. (2012). 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及其统计控制途径的模型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20(5), 757 - 769.

[24]严鸣, 赵楚铃, 朱瑜, 邬金涛. (2024). 员工主动性人格与创新行为的关系: 基于趋利 - 避害框架理论的实证研究. 管理工程学报, 38(1), 1 - 16.

[25]张春艳, 危亮, 杜海, 王婷炜, 张欣, 汪燕妮, 王建红. (2023). 社会支持在抑郁患者人格特征与生存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4(10), 1015 - 1020.

[26]张岚, 侯金芹, 陈祉妍. (2023). 员工主动性人格对工作幸福感的影响: 一个跨层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与行为研究, 21(5), 698 - 704.

[27]张璐, 乌云特娜, 金童林. (2024). 主动性人格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 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47(5), 1246 - 1253.

[28]郑爽, 刘红瑞, 李静, 席雨, 姚梅林. (2022). 主动性人格与大学生创业准备行为的关系: 创业意向的中介效应与创业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8(6), 813 - 821.